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国政府决策对世界的影响

银行业的去全球化

2016 的总结和 2017 的展望

英美经济领导地位的终结

政府经济预测与决策中的不确定性

中国国有企业将重新兴起吗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侯书漪

申劭婧

司 丹

谢晨月

杨 茜

伊林甸甸

张舜栋

朱子阳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侯书漪	科研助理
	安婧宜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洋	科研助理	刘畅	科研助理
周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侯书漪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美国政府决策对世界的影响 错误!未定义书签。

导读：美联储与 2016 年 12 月做出加息决定。这是美联储十年内第二次加息。这一决定意味着美国政策体制的转变，包括财政政策等。其产生的外溢效应对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短期债务流动在剧烈收缩，外商直接投资保持稳定 9

导读：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7 年国际债务统计已对全球用户开放，这体现了世界银行公开数据的承诺。根据这份报告，中低等国家的短期债务流动在剧烈收缩，而外商直接投资保持稳定。而高等收入国家的外债水平高于中低等收入国家。

欧洲的症结不在于民粹主义 11

导读：面对全世界关注的所谓“民粹主义”，作者认为这一视角并不可取，掩盖了真正的问题。他以意大利的案例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欧洲的最根本问题是无法实现增长，政府开支浩大，并非民粹和分配问题。

银行业的去全球化 13

导读：本文认为银行业的去全球化是全球资本流动放缓的一个推动因素。一些非传统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全球溢出效应。用来支持国内信贷的政策会增强资本流动微观审慎监管的作用，从而影响国际信贷。

英国在欧洲供应链中的地位受到冲击了吗 15

导读：本文主要研究脱欧后，英国在欧洲供应链中的地位是否会受到冲击。文章首先描述如何测量欧洲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供应链，然后评估英国参与的层度，最后得出结论。研究发现，英国汽车行业及相关服务，特别是运输和存储，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另一个重要部门——药品制造受到的影响较小。英国在欧洲产业链最重要的研发部门会受到负面影响，因为很多公司的总部会搬离欧洲。批发和零售服务行业的运输和存储部门将面临挑战，但未一定是负面的影响，如果公司在这些领域有充分的准备。因此，英国政府应该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脱欧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2016 的总结和 2017 的展望 17

导读：2016 年即将结束，人们将会记住这一年频出的奇迹和灾难。2016 带给我们一些以前难以想象的政治冲击，也带走了一些我们最优秀的音乐家。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2017 年，我们会怎样？

全球治理

英美经济领导地位的终结 19

导读：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和美国继任总统特朗普的确定，标志着这两个国家开始放弃自由经济。而作为自由经济时代的胜者，这也意味着英美这两个国家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终结。

经济政策

政府经济预测与决策中的不确定性 21

导读：本文认为过去的政策分析和经济状态估计缺少考虑不确定性，而这些确定性的分析让人难以置信，但结果事后可能是正确的。但特朗普当政后，可能会忽略事实，当“真相”出现后，相应的政策预测和估计都将是错误的。作者表达了对特朗普当政后政策分析的两点担忧，一个是他会严重削减官方统计机构的资金预算，另一个是拥有强烈政治中立名声的联邦分析师，会被迫修改数据以满足总统的需要。作者认为消除潜在危害的建设性方法就是建立研究中心和中立于政府的统计机构。在没有了解正常真相之前，我们需要多研究学习而不是行动。

学者眼中的美国梦 23

导读：在人类几百年的历史中，还很少有什么理念能像“美国梦”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美国梦”当中的一些关键信念，比如“子辈的收入状况会与其父辈更好”，是否已经褪色了？本文总结了近期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聚焦中国

中国国有企业将重新兴起吗？ 26

导读：本文认为，近期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在回升，但是并不能说明国有企业在中国的重新兴起。这看起来更像是国有企业的利润的周期性恢复，而不是国家和私营企业在相对作用上的根本性调整。

本期智库介绍 28

美国政府决策对世界的影响

Maurice Obstfeld /文 杨茜/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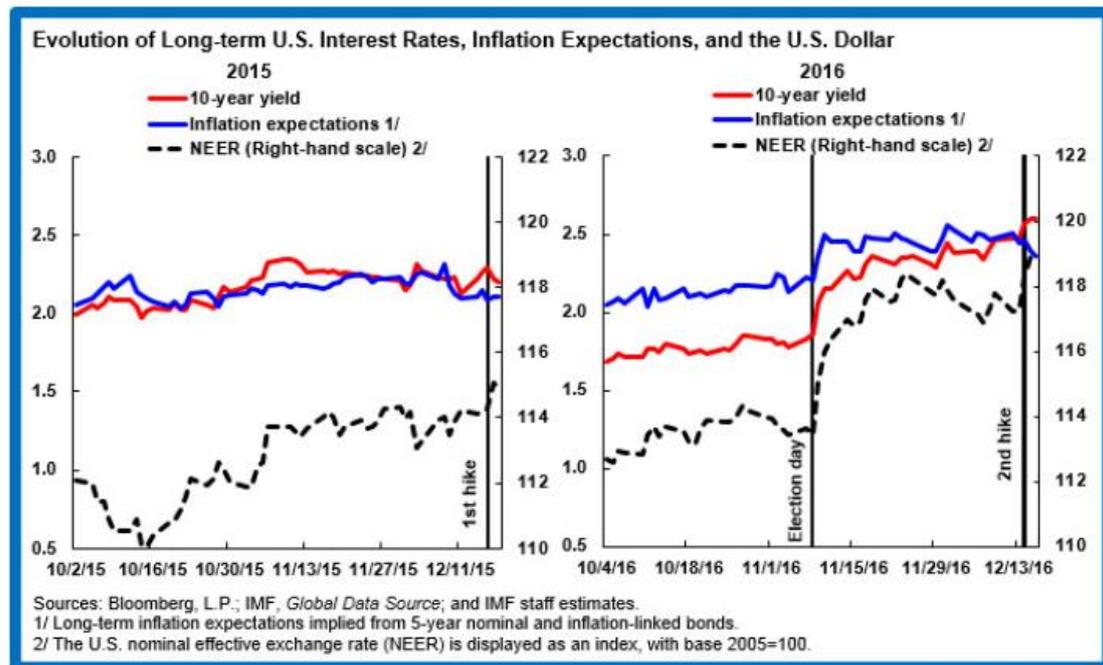
导读：美联储与2016年12月做出加息决定。这是美联储十年内第二次加息。这一决定意味着美国政策体制的转变，包括财政政策等。其产生的外溢效应对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编译如下：

经过一年的金融动荡、政治意外和许多地区的不稳定增长，美联储本月决定加息。这是美联储十年内第二次加息。这表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在复苏。

美联储的行动并不令人惊讶：市场几个周前已经预期到美联储的加息行为。但是，在美联储做出加息决定之前的市场发展却使许多市场观察者们感到惊讶。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2016年11月8日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之后不久，美国长期利率、美元和基于市场的长期通胀预期急剧上升。但此前2015年12月的美联储加息，却没有相对突然的市场反应。

在美联储加息的举动之后，美元进一步走高。



如果这些市场发展指向一个新的趋势，时间会说明一切。然而最有可能的是，这次选举标志着美国政策体制的转变，对市场价格甚至是整个美国可能产生更大的未来影响。而对美国以外的溢出效应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尤其显著，在其中一些经济体中，由于货币疲软而提高货币竞争力的优势能与之前的货币脆弱性相平衡。

从 2016 年初开始到美国大选，美国国债收益率一直非常低。全球经济前景的讨论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强调长期低增长和持续通缩压力甚至长期停滞以及持续低利率带来的风险。

然而，长期的名义利率受到美联储未来政策利率预期的影响，反而反映了美国通胀压力和经济的潜在力量。因此，对于美国长期利率的讨论，反映的不仅是当前的十二月加息，更是对未来的利率路径和对美国经济的未来需求的预期转变。

与上述预期一致，尽管上周的加息本身并不意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于未来的利率路径预期依然变陡，并且现在建议在未来的两年里进行三次加息。

美国大选后几天内突然出现资产价格波动，说明美国大选是影响市场走势的关键因素。特朗普当选为总统，再加上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结束了长达六年的美国政府分裂。

国会共和党人长期主张降低个人和企业税率。这也是特朗普在竞选时的一种主张，其中不仅包括大幅度减税，也包括增加某些类别的政府支出，特别是国防和基础设施。

在这个早期阶段，很难确切地知道财政政策将如何转变。然而，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它将通过更多的支出和更低的税率来实现财政政策的扩张。

总的来说，美国总需求的增加将导致实际产出的增加，随着新工人被雇佣、工作时间加长以及更加集中的机器使用，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会增加。4.6%的失业率和其他的劳动力市场危机的参数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到了金融危机之前，使得美国经济几乎没有剩余的停滞。除非新的劳动力参与或超时工作变得更普遍，否则，通胀压力将显著上升。这似乎是美联储决定迅速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时的想法。

美国利率的快速上升预示着美元进一步升值。对美国公司的国外经营利润继续投资海外的税收减免优惠，据估计有 2.5 万亿美元，也在推动着美元走强。鉴于更快的需求增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将扩大，即有更多的海外借款。其中一些可能会为日益增长的联邦财政赤字提供财政支持，这取决于美国财政一揽子计划的具体特点，即通过其他项目的预算削减、政府借款利率的路径以及经济增长的回报。

如果任何基础设施支出都被精心规划以提高潜在产出，美国的增长将更加强劲并伴随着更低的通胀率，以及鼓励投资、劳动力供给和包容性的税收措施。

鉴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其政策组合的巨大变化具有超越国界的一阶效应。

对美元贬值的发达经济体将受益于更高的美国经济增长和更具竞争力的汇率。对于大多数经济体而言，目前正在与低于目标的通胀作斗争，任何导致通

胀的压力（至少最初）是受欢迎的。他们也可能看到利率的上行压力，那些高负债但是没有从正向需求溢出效应受益的国家正面临财政挑战。

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可以从更具竞争力的货币和美国需求升高中获益。但是，尽管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增加了政策缓冲区（例如外汇储备），货币错配减少，金融监管框架也有所改善，有些国家仍会感到压力，尤其是在那些有已存在的政治或经济限制的国家中。

历史上，美国利率一直是进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净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灵活的汇率有助于缓解资本的快速流出，因为它们允许国际投资组合通过货币变动而不是储备亏损进行重新平衡。然而，美元升值和国内货币贬值相结合，可能会降低流动性或使资产负债表恶化，特别是考虑到居民和非居民企业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美元借款的重要性。此外，货币贬值可能会引发更高的通货膨胀。因此，新兴市场的决策者将保持警惕。

如果急剧的汇率变动和日益增长的全球失衡遵循美国政策制度的变化，保护主义压力将成为一个主要风险。过去出现过类似情况，鉴于发达经济体政府希望保持制造业，新兴市场在近几十年又已经取得了制造业的巨大发展，新兴市场经济体很可能是发达经济体建立更高贸易壁垒的主要目标。

因此，各国政府应该铭记，尽管贸易保护很诱人，其在国内仍然很可能会产生反效果，这种反效果甚至在贸易伙伴报复之前就会出现。发达经济体真正融入全球供应链强调了这种危险。在我们现在面临的严重分歧的政策组合环境中，全球贸易体系的规则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本文原题为“A Shifting U.S. Policy Mix: Global Rewards and Risks”。本文作者 Maurice Obstfeld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和研究主任。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IMF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短期债务流动在剧烈收缩，外商直接投资保持稳定

世界银行 安靖宜 / 编译

导读：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7 年国际债务统计已对全球用户开放，这体现了世界银行公开数据的承诺。根据这份报告，中低等国家的短期债务流动在剧烈收缩，而外商直接投资保持稳定。而高等收入国家的外债水平高于中低等收入国家。编译如下：

根据 2017 年国际债务统计发布的报告（IDS 2017），在金融危机后，中低等收入国家外债的本金还款首次超过了借入资金。

短期债务转为流出 3980 亿美元，为 2014 年同期的 4 倍。长期债务流动虽仍活跃，却下落到 2140 亿美元，是去年的一半。因此，外债滑落 6%，至 67000 亿美元，为国民总收入（GNI）的 25%。

同时，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动仍有弹性，净资金流（债务与证券总和）落至 3770 亿美元，是 2014 年的三分之一。

债务证券流动的趋势和政策含义在每个国家都有所不同。更具体的信息则可参加 2017 年国际债务统计，它包括了增长和趋势分析。以下为重点内容：

中低等收入国家外部债务股票总和下落 6%，至 67 亿美元。 债务净流出和对美元汇率变化是此次衰落的主要原因。外部债务证券额占国民总收入的 25% 和出口额的 98%。

2015 年的净债务流出为 1860 亿美元，与 2014 年净流出的 5400 亿美元形成鲜明对比，这反映了短期债务流动的剧烈收缩。

净资金流动落至 3770 亿美元，是 2014 年（11570 亿美元）的三分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仍有弹性，在 2015 年保持 5430 亿美元。组合证券流动连续四年保持活力，但却回落至 200 亿美元，是 2014 年的四分之一，反映出投资者对中国前景的不确定性。净资金流动从 2013-2014 年的 4.9% 下落 1.5%。

高等收入国家债务水平高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大多数高等收入国家的政府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2015 年都保持适度。

2017 年国际债务统计的数据来源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广泛的债务数据和一些高等收入国家数据。这些数据代表广泛，可在网上浏览和下载。用户可以浏览、汇总和下载各个国家的债务数据。

“这些代表广泛的国际债务数据是世界债务管理者和研究者的重要资源，可帮助他们管理全球资本流动。它们对公众开放体现了世界银行公开数据的承诺”，世行发展数据团队的主任如是说。

2017 年国际债务统计提供了统计图表，表现出在世界银行数据系统中的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外债情况。它也包括季度外债和公共领域债务数据库。数据来源可见 datatopics.worldbank.org/debt。

本文原题为 “Global Economy Sees Sharp Contraction in Short-term Debt Flow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mains Steady: World Bank”。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世界银行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洲的症结不在于民粹主义

Alberto Mingardi /文 朱子阳/编译

导读：面对全世界关注的所谓“民粹主义”，作者认为这一视角并不可取，掩盖了真正的问题。他以意大利的案例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欧洲的最根本问题是无法实现增长，政府开支浩大，并非民粹和分配问题。编译如下：

民粹主义这一名词产生于欧洲主义者 Boris Johnson、Michael Gove，新马克思主义者 Pablo Iglesias 等。事实上，这个词有很强误导性，除了贴标签的作用外无助于解释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大部分学者，包括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都坚持福利分配中的阶层分裂造成了民粹主义的产生。

最近且最贴切的例子是意大利的宪法公决，这一公决直接导致了意大利总理伦齐（Matteo Renzi）的下台。大部分媒体将其归结为“民粹主义”，但是，果真如此吗？

十分受欢迎的“五星”运动获得了极大的成果，得到了近乎 30% 的选票，并赢得了多次市政选举（包括罗马）。为了防止变为“极左”政党，这一政党也开始提出右翼主张。

在争取公决通过的时候，伦齐使用了和这一运动十分相似的主张，吸收了许多左翼成分，但是并没有产生很好的效果，

伦齐明白，选民对于宪法变革方面的细节性问题并不关心，所以他把公决变成了一项政治游戏，同意宪法改革就是同意他的政府继续执政，反对宪法改革则反对其继续执政。而大多数意大利人则投下了反对票，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自 1996 年以来的各种类似公决中，意大利人都实现了否决。过去 20 年，意大利人一直偏好改革派政治家，但现在已经厌倦，伦齐也不例外。

伦齐最大的失败就是其滞后的政府支出改革，并且未能刺激经济。自 2014 年执政，他就承诺了大胆改革，但随后发现无法实现，取而代之的就是其走向了扩大开支的老路。例如，给年收入低于 26000 欧元的公民提供每个月 80 欧元的补贴；对年满 18 周岁的意大利人提供了 500 欧元每年的所谓文化补贴；扩大了教师的雇佣规模等。就在公决前两天，伦齐还承诺提供政府雇员收入。这许多措施最终导致公共开支占 GDP 的比重在伦齐执政时期内上升一个百分点。

意大利的案例并非表明了“民粹主义”的无法避免，也不是说分配政策的失败。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政府开支无度且无法实现经济增长。

低增长可能培育政治反对力量。与其深究所谓“民粹”，不如研究一下为何在许多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都十分之低。政府开支如此浩大并征收如

此高的税收，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或许就是经济低效的原因所在。因此，对经济增长政策进行调整才是我们目前最应该关注的。

本文原题为“Europe’s Problem Is Not Populism”。作者 Alberto Mingardi 是 Cato 研究所访问学者。本文于 2017 年 1 月刊于 Cato 官方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银行业的去全球化

Kristin Forbes Dennis Reinhardt 和 Tomasz Wieladek /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银行业的去全球化是全球资本流动放缓的一个推动因素。一些非传统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全球溢出效应。用来支持国内信贷的政策会增强资本流动微观审慎监管的作用，从而影响国际信贷。编译如下：

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结果超出了大部分分析师的预期。随着欧洲投票和选举的进行，应该会有更多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不禁让人担忧全球化的步伐，包括贸易，劳动力以及资本的跨境流动。目前，全球化已经开始倒退。自 2011 年后，全球贸易占 GDP 的份额已经开始停滞，当前已经低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资本流动规模占 GDP 份额下降的幅度更大。

银行业的去全球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最初是发生在金融危机期间，最近的去全球化开始于 2012 年。自 2012 年，国际银行之间的借贷呈快速下降趋势。

第一阶段银行业去全球化主要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加大对银行体系的干预，人们对本国资源的偏爱，贷款需求降低，以及银行业的批发融资降低。第二阶段的银行业去全球化，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相互作用的溢出效应。某些非传统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相互作用的溢出效应会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银行监管和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变化

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调整金融政策，会对国际银行借贷产生重要影响。如，为了增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弹性，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尤其是，这会降低银行的国内和国际信贷。同时，很多央行实施非传统货币政策以刺激总需求，虽然这些政策并没有直接影响国际信贷，但它会通过影响国内和国际信贷的风险溢价来影响银行信贷。

虽然上述原因可以很好的解释银行跨境信贷的降低，但很难进行实证。原因如下：第一，很难区分跨境信贷的供给和需求；第二，不同政策之间相互作用，很难区分某一个政策的单独影响。最后，大部分国家政策的相应数据很难获取。

英国的案例研究

英国由于拥有完整的数据，以及最近几年英国金融体制采取大量的金融政策，很适合用来研究监管和货币政策是否是第二轮银行去全球化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英国银行资本要求上升 100 个基点，国际信贷的增长下降 3.4%。对于未实施融资贷款计划（Funding for Lending Scheme）的银行，这一紧缩效应更为明显。各种稳健性检验都非常显著。第二，量化宽松政策本应该加强银行监管的作用，但这一增强效应并不显著。此外，为了评估上述估计的结果是否可以

解释国际银行信贷的紧缩，我们使用银行的微观数据进行模拟。发现，从 2012 年中到 2013 年底，微观审慎监管和融资贷款计划大约可以解释英国跨境银行信贷降低的 30%。

结论

我们的结果表明，某些类型的非传统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的相互作用会产生重要的全球溢出效应。一些支持国内信贷的政策，比如英国的融资贷款计划，会对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作用产生影响。而且这些政策之间的溢出效应非常大，会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

本文原题为“[How the interactions of monetary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may have been ahead of the anti-globalisation backlash](#)”。本文作者 Kristin Forbes MIT 斯隆管理学院的全球经济学教授，Dennis Reinhardt 英格兰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Tomasz Wieladek 巴克莱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在欧洲供应链中的地位受到冲击了吗

ALICIA GARCÍA-HERRERO 和 JIANWEI XU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主要研究脱欧后，英国在欧洲供应链中的地位是否会受到冲击。文章首先描述如何测量欧洲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供应链，然后评估英国参与的层度，最后得出结论。研究发现，英国汽车行业及相关服务，特别是运输和存储，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另一个重要部门——药品制造受到的影响较小。英国在欧洲产业链最重要的研发部门会受到负面影响，因为很多公司的总部会搬离欧洲。批发和零售服务行业的运输和存储部门将面临挑战，但未必是负面的影响，如果公司在这些领域有充分的准备。因此，英国政府应该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脱欧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编译如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经济已经成为很多行业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受益于全球主要跨国公司的投资，英国已成为出口领袖，尤其是汽车和医药制品领域。试问，退出欧盟之后，英国在欧洲供应链中的地位受到冲击了吗？

诚然，由于缺乏未来英国和欧盟之间关系的信息，我们很难准确测量英国脱欧对其供应链的影响。如果英国继续是欧盟市场的一部分，那么英国参与欧洲供应链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如果当前的零关税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限，那么英国参与欧洲供应链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首先描述如何测量欧洲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供应链，然后评估英国参与的层度，最后得出结论。

供应链的概念和测量

我们使用 OECD 贸易增加值最新数据得到衡量全球价值链的指标，主要采用上游和下游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中间产品进口在 GDP 中的份额。这一指标衡量原产地是英国的国际中间品规模。第二个指标是出口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占 GDP 的份额，捕捉英国为贸易伙伴提供的商品和商业服务。为了分析福利含义，我们计算了供应链中英国的增加值，尤其是出口和国内最终需求产品的增加值。

英国在全球供应链尤其是欧洲供应链发挥重要作用

英国出口的全球商品和服务占 GDP 的 18.16%，高于日本和美国。英国进口的中间品和服务占 GDP 的 17.6%，也高于很多国家。而且，英国的价值链一体化主要是和欧盟，将近一半的中间品进出口是和欧盟的国家进行。但整个欧盟的进出口只有 10%是和英国进行，因此英国和欧盟在彼此的供应链中存在不对称性。一旦英国脱欧，相比于欧盟其它国家，英国在欧盟的供应链将会遭受更大的负面影响。

两个部门遭受的负面影响最大：汽车和医药

尽管英国是服务型导向的经济体，但它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部门主要是商品和制造业。英国脱欧对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中间品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没有最终的

英国和欧盟关系信息，我们很难做出精确的评估。我们假设英国和欧盟只保持最小关税同盟的关系，有三个行业非常关键：运输设备、化工/矿产和电/光设备，占据英国一半的非食品加工附加值。

数据表明，影响最大的是交通运输设备行业。最小关税同盟对其征收的税负高达 10%，小汽车是 2%——4%。化工/矿产所受的影响不大，因为关税同盟几乎对其征收零关税。

另外，在对服务业的分析表明，最相关的部门是研发。如果大型跨国公司将其总部从英国搬回欧盟，那么英国对欧盟的技术研发出口将会大幅度的降低。其次是批发和零售服务，运输和储存，但脱欧对这两个行业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果这两个行业积极调整应对环境的变化，有可能会带来新的机遇，创建新的工厂。如果有大量的企业搬出英国，那么英国将很难保持这两个行业的市场份额。最后是金融服务。如果一些国际生产活动移动到其它国家，那么对英国的国际金融服务将会削弱。更糟糕的是，如果欧盟的高技术金融精英不能自由流向英国，那么英国雇佣金融精英的成本将会大幅度增加，这会严重破坏英国的金融活动。

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们发现，英国汽车行业及相关服务，特别是运输和存储，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另一个重要部门——药品的影响较小，因为与欧盟关税贸易协定之外的关税增加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英国在欧洲产业链最重要的研发部门会受到负面影响，因为很多公司的总部会搬离欧洲。批发和零售服务行业的运输和存储部门将面临挑战，但未必是负面的影响，如果公司在这些领域有充分的准备。因此，英国政府应该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脱欧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第一，就贸易而言，英国脱欧后最好的策略是保持与欧盟的单一整体市场；第二，英国需要更加透明关于脱欧后对英国---欧盟的贸易协议；最后，避免英国的研发人员脱离欧盟的研究网络。英国政府必须继续鼓励研究合作以吸引更多的国际化科研人员。

本文原题为“Is the UK’ s role in the European supply chain at risk? ”。本文作者 ALICIA GARCÍA-HERRERO 是 Bruegel 的高级研究员, JIANWEI XU 是 Bruegel 的访问学者。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2016 的总结和 2017 的展望

Silvia Merler/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2016 年即将结束，人们将会记住这一年频出的奇迹和灾难。2016 带给我们一些以前难以想象的政治冲击，也带走了一些我们最优秀的音乐家。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2017 年，我们会怎样？编译如下：

托尼·巴伯（Tony Barber）认为，我们可以将 2016 年总结为一个词“Bundespräsidentenstichwahlwiederholungsverschiebung”，大致翻译为“联邦总统竞选重演的推迟”，他所指的是 2016 年奥地利总统大选推迟重新进行第二轮选举。这个单词有 51 个字母，读完需要 4 秒，它准确地描绘了这个混乱的 2016 年。

FiveThirtyEight 收集了关于 2016 年最好和最坏的几个数据故事。“统计坚定奖”颁给了洛杉矶时报的民意测验，在今年的总统竞选中，它是全国主要的民意调查中唯一一家持续显示唐纳德·特朗普在普选中领先的媒体。因为在密歇根弗林特的水危机中的表现，马克·爱德华兹（Marc Edwards）被授予“最好地利用数据去对权力说真话”的奖项。至于那些不太重要的奖项，“大胆使用未经检验的算法来代替经验丰富的员工”的奖项不出所料颁发给了 Facebook，而唐纳德·特朗普则荣获了“‘我们还在这样做吗？’—故意曲解政府统计奖”。

谈到 2017 年，人们期望些什么呢？一些有趣的数据来自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的年末调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收集公众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的看法，自 1977 年以来每年都在进行。好消息是，全世界 68% 的人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高兴，而全世界 42% 的人对 2017 年的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

然而，如果我们看看欧盟的结果，事情就不会那么乐观了。在欧盟，42% 的受访者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前景悲观。除爱沙尼亚外，没有欧洲国家排在全球最乐观国家的前十名，而这些欧洲国家恰好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但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国家却更多地在全世界最悲观的国家中排名前十。就希望指数而言，意大利是世界上最悲观的国家，其次是希腊（第三），保加利亚（第七）和比利时（第八）和奥地利（第九）。就经济形势而言，前 10 名几乎全部由欧盟国家组成：希腊再次成为世界上最悲观国家中的第三名，其次是意大利（第六），比利时（第七），奥地利（第八），英国（第九）和法国（第十）。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确实还有更多危险等待着欧元区，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现状的分歧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如果欧元区无法使成员国广泛地共享繁荣，它将很容易受到政治和经济冲击。此外，今年将会发生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

在全球层面，杰夫瑞·法兰克（Jeffrey Frenkel）列出了 2017 年的五个关键因素。首先，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新政策的出台将继续存在不确定性，其次是美元的强势和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那些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和/或有美元债务的国家的困境也将变得非常重要，例如中国将被迫在阻止人民币贬值和进一步国际化之间做出选择。70 年来美国引领全球迈向自由国际秩序的时期可能终结，这显然也是一个关键问题。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亚当·斯莱特（Adam Slater）还列出了 2017 年的 10 个主题，从中可以发现商业机会。

就美国而言，比尔·麦克布赖德（Bill McBride）也为 2016 年美国提供了十个问题。经济学人的蒂姆·杜伊（Tim Duy）怀疑 2017 年美联储是否会经历一次 2016 年的重演。在经济预测最新的总结中，美联储官员预计 2017 年会加息三次，每次加息 25 个基点。但这既不是一个承诺，也不是一个预测，而现实可能是非常不同的（我们都知道 2016 年是如何从“加息四次”变成“加息一次”的）。然而，我们很难在 2017 年看到同样的情况。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认为，2017 年我们将正式进入“无能时代”。特朗普将以低于 50% 的支持率开始他的总统任期。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信号，即，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政府实际上并不民主。同样也前所未有的是，实际上没几个共和党成员、更没有民主党成员认为他适合担任总统的职责。

最后，经济学人是在寻找意外可能来自何处。第一个意外可能是，特朗普的财政政策将不如预期有效。第二个意外可能是政府债券的表现没有那么糟糕。第三个潜在的意外是，如果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法国被击败并且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德国连任，那么欧盟的解体或许能够避免。2017 年的另一个潜在意外可能来自于一个大的市场混乱，比如一个脆弱市场的难以解释的崩溃（即使这个崩溃是暂时的）。最后的意外可能来自于黄金市场，因为当存在政治风险时，金价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本文原题为“2016: The end”。本文作者是 Silvia Merler，她于 2013 年 8 月加入 bruegel，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际宏观金融经济学、中央银行和欧盟机构以及政策制定等。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美经济领导地位的终结

Robin Niblett / 文 申劭婧 / 编译

导读：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和美国继任总统特朗普的确定，标志着这两个国家开始放弃自由经济。而作为自由经济时代的胜者，这也意味着英美这两个国家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终结。编译如下：

英美两国已经放弃了其作为经济自由化运动的领导地位。

自从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世界各国就开始在经济方面效仿英美两国——私有化，放松监管，向外国贸易和投资打开市场等。这些都被称作“盎格鲁-萨克逊模型”。

现在，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特朗普的上台都意味着英美对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终结。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都不能继续领导自己的国家一级更大范围内的世界在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本质上，英美两国的投票结果显示出他们渴望重新获得对国有经济的控制。

对于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这意味着放弃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主义，因为他们相信正是自由主义导致了工资增长的停滞，以及失业率的增长。这种思潮的使得一个“特朗普平台”诞生，它致力于惩罚那些因为优先考虑全球供应链而将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的公司。同时，美国也将减少、甚至取消与墨西哥的经济一体化，并放弃或重新考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而这正是奥巴马政府深化整个太平洋地区自由市场价值的一步大棋。

英国脱欧则传达了一个复杂的信号。全民公投的结果表明，大多数英国人还是倾向于开放的市场和投资环境。然而，欧盟单一市场成员的身份使得英国承担了危及了一部分主权的过重责任，尤其是来自欧盟其他地区劳工的自由流动。许多英国人认为，近年来外来劳工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工资增长的停滞、过重的公共服务以及房价压力。

一个拥护自由市场的脱欧支持者认为，欧盟成员的身份使得英国贸易政策因为欧盟的集体谈判制度而受到禁锢。这阻碍了英国在服务业等自身擅长领域与新兴市场开展贸易活动。

但是，即使目前欧盟承担了英国 45% 的出口，一旦英国离开欧盟，它在未来将不再在欧盟单一市场自由化进程中发挥任何作用。资本市场联盟的计划，即清除金融服务中的贸易障碍以及更加开放的电子市场的计划将继续进行，但是谈判中将不再有市场友好的英国的声音。

英美两国的投票人终止了盎格鲁-萨克逊模型的合理演变，它已经从消除贸易壁垒发展到减少国家边界，即处理一些限制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的非关税规定造

成的复杂情况。政府一般利用这些规定来追求国内政治利益，比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但是他们也可以利用其来保护经济部门免受外部竞争。

参与设计打破欧盟间非关税壁垒的单一市场的正是撒切尔任命的英国欧洲专员 Cockfield 爵士。然而，这个目标的达成需要引入够资格的多数选举概念。30年后，许多英国人将这个想法误读为许多其他成员国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规则，却没有考虑这些规则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类似的，新选出的总统特朗普已显示出带领美国离开提高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公约的迹象。而他将更加关注减少美国商业的国内环境限制因素，以及他认为同样阻碍了经济增长的危机后的金融规章。

美-欧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在这种形势下前景黯淡。目前，美国和欧洲的立法者都不再有动力在政治敏感领域，如食品安全、环境、制药等，继续规则标准的妥协。

事实上，我们也许将引来一个跨大西洋常规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除去一直不断的对转基因在农业中使用的争论，欧盟已经开始质疑美国公司数据保护的标准以及避税方法。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对此采取激进的回应。

对英国来说，这将造成一个两难困境。因为这使得它在探索脱欧后与美国贸易互动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大西洋地区和其市场——欧洲的规制融合中做出选择。

讽刺的是，这两个自由经济下的赢家在本国都准备停止自有经济的继续深化，而是转而回到一个选择性和事务性更强的贸易时代。

也许这样将会给两国的政治家和公民们充足的时间来调整过去自由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美国和英国是在 WTO 已经瘫痪、经济强国可以利用这一真空推销本国经济模式的形式下选择了后退，这也为经济国家中心模式的中国和政治国家中心模式的俄罗斯提供了很大机会。

本文原题为“The Demise of Anglo-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本文作者 Robin Niblett 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政府经济预测与决策中的不确定性

Charles Manski /文 司丹/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过去的政策分析和经济状态估计缺少考虑不确定性，而这些确定性的分析让人难以置信，但结果事后可能是正确的。但特朗普当政后，可能会忽略事实，当“真相”出现后，相应的政策预测和估计都将是错误的。作者表达了对特朗普当政后政策分析的两点担忧，一个是他会严重削减官方统计机构的资金预算，另一个是拥有强烈政治中立名声的联邦分析师，会被迫修改数据以满足总统的需要。作者认为消除潜在危害的建设性方法就是建立研究中心和中立于政府的统计机构。在没有了解正常真相之前，我们需要多研究学习而不是行动。编译如下：

估计任何经济政策的影响几乎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对美国政策的评估。精确的预测政策结果和估计经济状态都是例行公事，其中很少描述涉及到的不确定性。由于预测和估计是建立在不支持的假设和有限的的数据之上，所以预测是脆弱和不可靠的。

美国现在的新总统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区分事实和虚构。我担心过去政府政策的难以置信的确定性分析很快就会在新问题面前变得次要。难以置信的确定性预测和估计，事后可能是正确的。但“真相后世界”的政策预测和估计显然都是错误的。

为了解释我的担忧，我重申一下对现状的批评。国会预算办公室知道预算的复杂性以及深远影响。但国会还是要求预算办公室对未来十年预算做出准确的预测，而且不考虑任何的不确定性。至于经济状态的估计，我研究了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劳工统计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发现他们在不考虑样本偏误的情况下估计 GDP 的增长，失业和家庭收入数据，而且他们的工作人员很清楚这些数据存在统计抽样误差。进一步探索为什么难以置信的不确定性是常态，我发现是激励因素的作用。很多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不愿意面对不确定性，因此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有动机去进行确定性的汇报。

尽管政策制定者不愿意听到具体指标的某一个范围，但我认为经济学家有必要汇报他们认为合理的取值范围。官方统计机构在估测经济指标时，应该考虑样本偏误，使用一定的计量和实证方法，将误差尽量降到最低。

展望未来，我更担忧特朗普当政后的政策分析，对此我有两点担忧。一个是他会严重削减官方统计机构的资金预算，另一个是拥有强烈政治中立名声的联邦分析师，会被迫修改数据以满足总统的需要。连贯的政策讨论在当前的政策环境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

消除潜在危害的建设性方法就是建立研究中心和中立于政府的统计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国会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支持，但这些机构必须是非官方的，以

便他们做出可靠的估计和分析。这样的机构目前在美国还没有，英国的财政研究所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

虽然我们一直致力于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政策分析，但我依然认为如果我们敢于去面对不确定性，我们的社会会变得更好。很多我们的政策争论源于我们不敢承认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在没有了解正常真相之前，我们需要多研究学习而不是行动，这样我们才会做的更好。

本文原题为“Policy analysis in a post-truth world”。本文作者 Charles Manski 为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1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学者眼中的美国梦

Silvia Merler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在人类近几百年的历史中，还很少有什么理念能像“美国梦”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美国梦”当中的一些关键信念，比如“子辈的收入状况会比其父辈更好”，是否已经褪色了？本文总结了近期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编译如下：

定义“美国梦”的关键元素之一是人们对收入状况改善的信念，也就是说，人们相信在美国，子女长大后能获得比父母当年更好的经济条件。然而，尽管这个问题有很强的研究和政策价值，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家户面板数据，这个问题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Halikias 和 Reeves（2016）将一份美国城市研究所的工作论文和皮尤的民调结果进行了对比，发现不同研究者对“美国居民收入状况是否在改善”这一问题抱有非常不同的观点。

通过使用税务数据，Raj Chetty, David Grusky, Maximilian Hell, Nathaniel Hendren, Robert Manduca 和 Jimmy Narang 采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克服了以往存在的大样本面板数据缺乏的问题。本文是该“机会均等项目”的一部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获得我们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作者发现美国国内代际间收入状况获得改善的比例从 1940 年代的 90%，下降到了 1980 年代的 50%。在我们考虑了多种通胀折算比例、收入定义方式及转移支付后，这个结论一直保持稳健。通过数据模拟，作者发现仅仅通过 GDP 增长不能将收入状况改善的比例提高回 40 年代的水平。与之相反，如果我们注重调整不同收入组间财富增长比例的平等性，则能够将收入状况改善的比例提高到 40 年代水平的 70%。这一发现意味着，重塑收入普遍增长的“美国梦”，要求我们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对各收入水平居民的普惠性。

Figure 1. Baseline Estimates of Absolute Mobility by Birth Coh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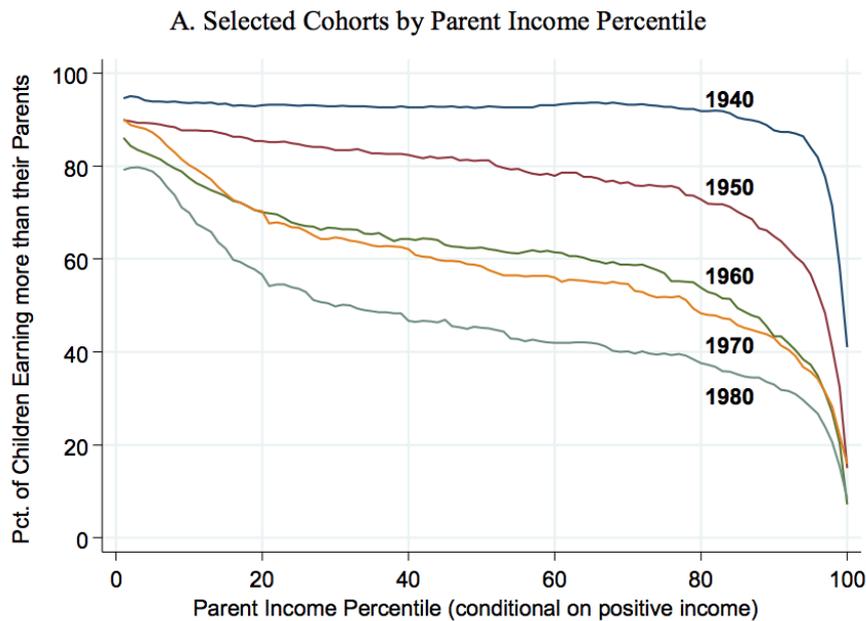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出生组内收入状况改善的比例

作者在另一篇论文中也使用了这套数据，用以检验子代受教育水平、父母收入水平以及子代最终收入水平是否获得改善之间的关系。作者发现，如今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相比于他们的父母获得收入状况改善的比例与 70 年代生人的比例是类似的。然而，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与 70 年代相比，如今父母收入水平对子代最终收入的影响变得更大了，这也无疑恶化了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Branko Milanovic 和 Roy van der Weide 认为，越来越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与代际间收入差异一起，使得美国社会阶层流动性越来越差。他们使用美国各州统计的 1960 到 2010 年间的微观数据，检验了不同收入组内收入不平等程度对这些组内收入增长速度的影响。他们发现，对于较为贫困的居民而言，更高的不平等程度使得其收入增长速度相应下降，但对于较为富裕的居民来说，不平等程度与其收入增长速度是正相关的。当把这些数据合并起来分析后，他们发现，在各项因素当中，顶尖收入组的不平等程度是导致底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罪魁祸首。

当然，在不平等的问题上，地理因素也是很重要的。Chetty, Hendren, Kline 和 Saez 发现在美国的各地区，代际间收入获得改善的状况大相径庭。比如说，出生于夏洛特底层收入家庭的孩子最终进入顶尖收入人群的比例是 4.4%，而这个比例在圣何塞是 12.9%。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地区差异？Chetty 等认为，高收入流动性的地区具有以下特征：(i) 区内定居的不同阶层的居民混合居住的比例更高，(ii) 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iii) 拥有更好的基础教育，(iv) 社会资本存量，(v) 家庭稳定性更好。

ONLINE APPENDIX FIGURE V
Estimates of Absolute Upward Mobility Pooling 1980-82 and 1980-85 Coho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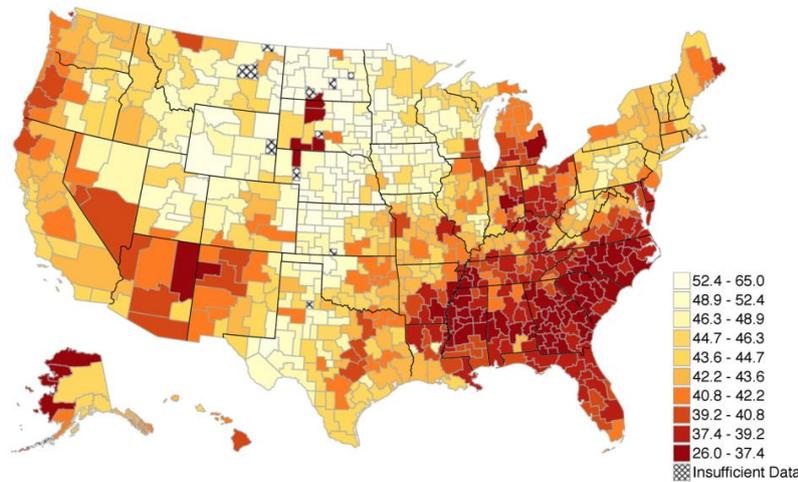


图 2 不同地区内收入状况获得改善的比例

那么，又有哪些因素在影响人们的迁移决策呢？Larrimore, Mortenson 和 Splinter 研究了导致人们收入水平变化的因素，包括工作及行业变迁、婚姻、离异以及区域迁徙。他们发现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改变工作、转换就业的行业，以及搬迁到其他州都与其收入变化相关。未婚男性搬迁到其他州将导致其平均收入水平略有上升，而已婚男性则可能略有下降。对于女性，无论其已婚或是未婚，变迁到其他州都会使得其收入水平有所下降。

正如其他学者所指出的，近年来美国的工人已经远远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会轻易地选择搬迁，而以上作者的发现恰恰可以从收入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Molloy, Smith, Trezzi 和 Wozniak 最近也从数据的角度告诉我们，从 80 年代早期开始，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通常用工人岗位和工作的变换频繁程度来衡量）就一直在显著地下降。而且，这种流动性的下降并不太可能单纯是工人-企业匹配程度改善所导致的。他们认为，可能的解释包括有企业特征（比如公司的规模和历史）的改变、工人-企业匹配程度的改善、和社会信任度的降低（这意味着工人在面临是否跳槽的决策时更加厌恶风险）。

本文原题为“*The American Dream*”。本文作者 Silvia Merler 为 Brugel 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国有企业将重新兴起吗？

Nicholas R. Lardy, Zixuan Huang / 文 伊林甸甸/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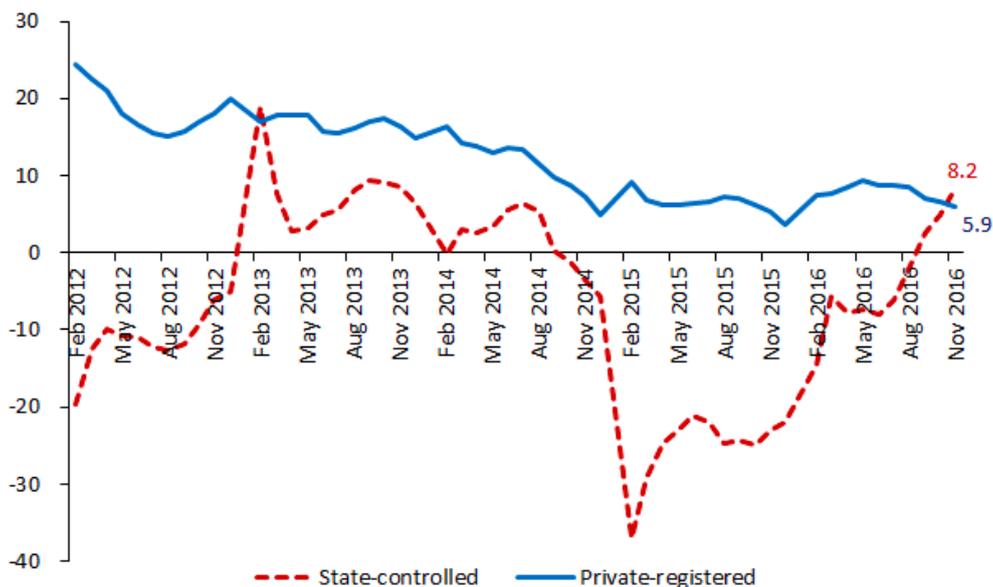
导读：本文认为，近期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在回升，但是并不能说明国有企业在中国的重新兴起。这看起来更像是国有企业的利润的周期性恢复，而不是国家和私营企业在相对作用上的根本性调整。编译如下：

根据中国权威统计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近四年来，中国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首次超过了私营注册工业企业。

早些时候，《中国经济观察》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了 2016 年上半年里中国国有企业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大幅上升，同时私营企业的作用明显下降。从而得出结论——国有企业的相对作用增加，但增长比例不及官方数据所给出的那么高。

根据最新数据，11 月份国有企业利润上升 8.2%，私营企业利润仅上升 5.9%。这是否是中国在习近平主席执政下回归国家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先兆呢？

图 1 工业利润增长（年初至今），2012 年 2 月至 2016 年 11 月（单位：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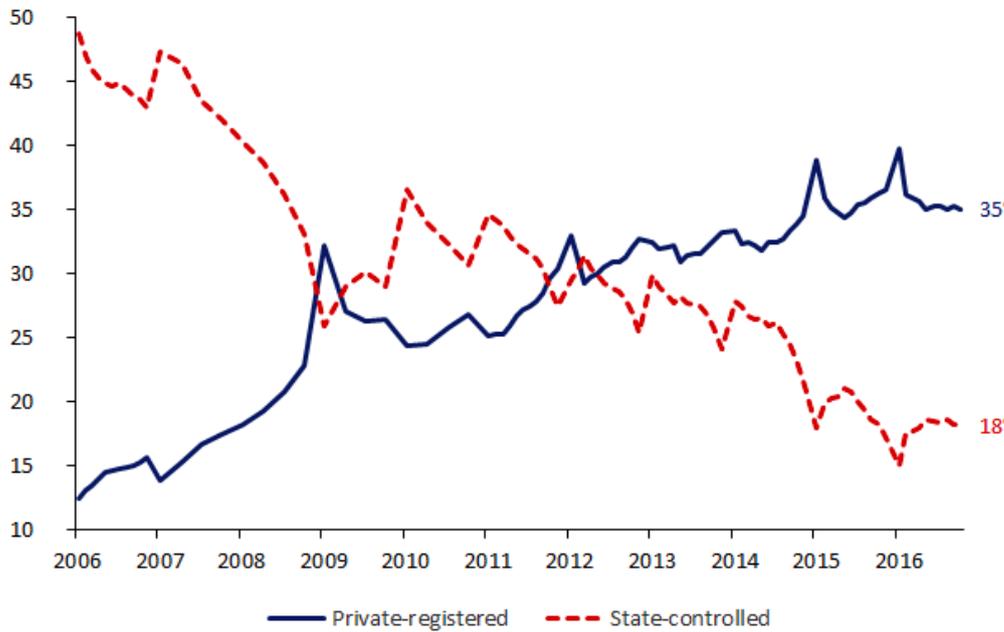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简而言之，并没有。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自 2015 年灾难性下降逾 20%，到 2016 年仍在恢复（见图 1）。相比之下，私营公司的利润在 2015 年增长了近 4%。因此，对比来看，今年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基础更强，因而也更为稳健。

事实上，国有控股企业产生的工业利润所占份额已经持续下降了至少十年，而且只有私营企业所占份额的一半左右，今年也没有出现大幅增长（见图 2）。总之，这看起来更像是国有企业利润的周期性恢复，而不是国有和私营企业在相

对作用上的根本性调整。私营企业在今年前 11 个月内获利 2.1 万亿元人民币，而国有控股公司的利润只有 1.1 万亿元人民币。

图 2 工业利润份额（年初至今），2006 年 2 月至 2016 年 11 月（单位：百分比）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此外，这些数据低估了私营工业企业的相对利润。国有工业利润的数据是非常全面的，包括传统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国家主体或主导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利润。私营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仅涵盖了注册的私人公司，不包括私人主体或主导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利润。综合来说，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估计可以占工业利润总额的约 55%，大约是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的三倍。

本文原题为“Resurgence of State-Led Growth in China?”。本文作者 Nicholas R. Lardy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Zixuan Huang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分析员。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4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8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The World Bank (WBG) 世界银行

简介：世界银行（WBG）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简称，“世界银行”这个名称一直是用于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这些机构联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其一开始的使命是帮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的国家的重建。今天它的任务是资助国家克服穷困，各机构在减轻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网址：<http://www.worldbank.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